

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著 顾农讲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著 顾农讲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学史纲要/鲁迅著;顾农讲评.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29-621-8

I. 汉… II. ①鲁…②顾… III. 文学史—中国—两汉时代 IV. I20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4523 号

- 书 名** 汉文学史纲要
著 者 鲁迅 著 顾农 讲评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无锡市扬名高新技术产业园 B 区 75 号 邮编:214024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5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21-8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0—85435666)



鲁迅与《汉文学史纲要》

顾 农

—

二十年代上中叶，鲁迅为教学的需要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1926年下半年，他应林语堂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同时在国文系（亦称国学系）任教，为此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略》。其时厦大国学院内外矛盾重重^①，鲁迅很快就离开了这里，南下广州，任职于中山大学，所以他在厦门编文学史只从事了很短的时间，留下了一部未完稿，这就是通常称为《汉文学史纲要》的这部著作。

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九卷对所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有如下的说明——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十八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九卷对所收《汉文

^① 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书之第九章《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陈漱渝《林文庆：一个难勾脸谱的人物——兼谈鲁迅跟厦门大学一些人的分歧》，《鲁迅研究月刊》2009 年第 1 期。



学史纲要》一书则有新的说明——

本书系鲁迅 1926 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1938 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本版仍沿用。

这两份说明写得很客观。据此可知，这份讲义最初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而 1938 年和此后两版全集都采用了《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书名。这一书名虽然一向流行，其实却比较难以理解，甚至也不那么最恰当——这里的“汉”字究竟是指汉族呢，还是指汉朝？好像都不清楚，也不大容易讲得通。当然，1938 年版《全集》开始采用这一书名自有其根据，因为在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表上用过“文学史总要”、“文学史纲要”这样的名目^①，而且当年油印本讲义的第四至第十篇的中缝处都写有“汉文学史纲要”的字样。这个名目有人认为可能出于鲁迅本人的意见，而更大的可能则是印制讲义的人以意为之，而这一失误当时未及订正。至于中山大学油印本讲义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大约是从上古到汉朝的意思。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鲁迅在这里实际上讲得很少，大约也就只到汉朝为止——他本来是打算讲到隋的。

同一本书有三个书名，用哪个好呢？为了防止误会，继续采用《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传统书名，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的办法似乎是采用《中国文学史略》，该讲义开头用的正是这几个字，1926 年 9 月 25 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用的也是这个名目（“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到 1928 年 2 月 24 日致台静农信中还说过“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可知《中国文学史略》这一书名最为确切有据；可是由于已出的诸版《全集》影响极大，《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书名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现在也只能

^① 此据厦门大学鲁迅研究室所藏《国学系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教员担任科目时数表》、《文科教员每周授课时数表》，详见《鲁迅生平资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19 页。



尊重这一已成之局。

二

厦门大学当时规模很小,全校仅有三百多名学生^①,正式来听鲁迅讲文学史课程的学生只有十多人^②,其他许多乃是来自校内外的旁听者。但鲁迅编撰这部文学史讲义时态度非常认真,1926年9月14日他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玉堂(按即林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预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鲁迅对文学史著作要求很高,一般的讲义他固然不甚以为然,就是正式出版的著作,他认为好的也很少,稍后他说过“文学史……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的信)。鲁迅为自己悬了一个很高的目标,“想好好的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1926年9月22日致许广平的信)。其间许广平曾提醒鲁迅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作为教材不宜过深:“对于程度较低的学生,倘使用了过于深邃充实的教材,有时反而使他们难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③;对此鲁迅未置可否。看来他编撰这部文学史讲义不仅为了供一时教学之用,还有着更高远的学术追求。

① 鲁迅1926年10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厦门大学“学生止三百余人,因寄宿舍满,无可添招。此三百余人分为预科及本科,本科有七门,门又有系,每系又有年级,则一级之中,寥落可知。弟课堂中约有十余人,据说已为盛况云。”详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按当时厦大本科分为文、理、教育、高、法、医、工七科,参见汪毅夫《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一)》,《福建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② 更具体地说是十二人,详见《鲁迅生平资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旁听者无从统计,据后来也到了厦门大学任职的川岛(章廷谦)先生说,“来听讲的不仅是国文系的全部和文科各系的学生,也有理科和法科的”(《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红旗飘飘》第一集)。据有关回忆录,旁听者还包括一些青年教师和校外的记者等等。

③ 许广平1926年10月14日致鲁迅信的原件,《许广平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编入《两地书》时这一层意思被删去。



鲁迅的工作异常刻苦，他在1926年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鲁迅本打算在离开厦门之前编到汉末，而实际上只写到司马迁、司马相如。鲁迅在北京女师大执教时曾经系统地选讲过汉代从司马相如到蔡邕的辞赋和散文^①，材料相当熟悉，可惜没有来得及写下来。他对已经编成的这份讲义并不满意，对老朋友说“编制大草率”，“挂漏滋多”（1926年9月19日致沈兼士的信），这不完全是客套。

编写文学史需要大量图书，鲁迅一方面利用厦门大学的藏书，一方面自己到处买书。他从上海先后邮购得《说文解字》、《世说新语》、《晋二俊文集》、《玉台新咏》、《才调集》、《唐艺文志》、《元祐党人传》、《眉山诗案广证》、《建安七子集》、《汉魏六朝名家集》、《八史经籍志》、《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及其续编、《经典集林》、《孔北海年谱》、《玉溪生年谱会笺》等等，从苏州邮购得影宋本唐诗、《峭帆楼丛书》、《徐庾集》、《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诗集》、《穆天子传》、《花间集》、《温庭筠诗集》、《皮子文藪》等等，托孙伏园在广州购得《乐府诗集》、《山海经》、《资治通鉴考异》、《笺注陶渊明集》等。从上述书目看，当初鲁迅至少打算将讲义编写到唐，而对汉魏六朝一段尤多研究的兴趣。后来鲁迅重新考虑写文学史，也大抵只准备写到唐。

离开厦门前夕，鲁迅计划此后的工作，有这样的自白：“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预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认为研究和创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难以同时并举。他曾对国文系同事罗常培教授说过，研究需要沉下心去搜集材料处理材料，人的才智沉下去了就浮不上来，浮

^① 参见顾农《关于一份鲁迅手订目录的说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该文现已列入本书附录。



上来也就不容易沉下去,所以研究同创作不能同时兼顾^①。

事实上后来鲁迅在“四·一二”政变以后曾一度打算退却,回到文学史研究上来;“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腹背受敌,又一次考虑过今后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据冯雪峰回忆,1929至1931年间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时候,他常常谈起的多是文学史的方法问题。鲁迅先生一向已注意到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的关系,这时候似乎更觉得非先弄清楚历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可。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更需要有一部社会史,不过这当然更难。’这时他对俄国社会史的有价值的著作及西欧的艺术史(如霍善斯坦因等人的著作)都极有兴趣的细阅,我觉得这和他自己准备写文学史不是没有关系的”^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写文学史,确实是鲁迅此时考虑得很多的一个问题。1929年初夏鲁迅回北京省亲,一度打算从旧居的藏书 中 择取若干带回上海来编写文学史以及《中国字体变迁史》,但后来由于忙于更迫切的战斗,这两项工作都没有动手。

1932年夏,鲁迅与瞿秋白深入讨论过文学史上一系列问题,现在还可以看到当年6月10日秋白致鲁迅的一封长信^③,十分可惜的是,鲁迅的议论未尝见诸文字。

鲁迅还曾经设想写出若干篇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文学史片段,逐渐积累起来,事实上也未及动手。后期鲁迅始终没有沉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火热的现实斗争强烈地召唤他。既执著于短兵相接的当下,又不能忘情于长线的学术研究,这样就难免产生出矛盾和苦

^① 详见罗常培《蜀道难·自序》;参见顾农《思维的沉与浮》,《海上闲话》,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227页。

^② 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版1981年印刷本,第198页。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国文艺学家。

^③ 此信当时未发表,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曾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5~84页,题作《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闷来。集学者与战士于一身，总是难免要有这种苦闷的，鲁迅内心深处的这种矛盾典型地见之于1929年省亲期间致许广平的几封信、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以及同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等等文件之中。

往往是社会最黑暗鲁迅自己处境也最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关起门来研究文学史；然而也正因为太黑暗了，他又不得不义无反顾地拿起杂文为匕首和投枪，“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说得好：“潜心于他的宏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后期鲁迅没有能够回到文学史上来，就学术而言固然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但就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局而言，他的选择是勇敢而明智的。

三

《汉文学史纲要》凡十篇，内容丰富，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至今读去仍然可以得到很深的启示。

从撰写的体例看，本书叙述史料多于评论，征引甚博，作者议论无多，他的意见大抵即寓于材料的取舍安排之中。凡有断语，都简明精当，无可移易。例如本书指出，诗歌产生于文字形成之先，源于劳动，而文字的起源则“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功归一圣，亦凭臆之说也”。又如关于秦代文学，可讲的内容本来不多，鲁迅则列举具体材料，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群臣相与歌颂始皇之功德，刻于金石；一方面是东郡的老百姓刻陨石以诅始皇，而石旁居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里鲁迅没有直接发表什么议论，但已经把当时的形势和气氛都说清楚了。

鲁迅写文学史特别重视知人论世，决不孤立地分析文本。周室衰微，诸侯并争的局面必然促使思想和文学的活跃，其中既有从不同立场出发来挽救时弊的志士，也有为一己之利禄奔走呼号的游士，于是“著作云起”，蔚为大观；而屈原的诗歌创作则与当时楚国内部两派的纷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崇



高的人格和卓绝的才华交相为用，一起构成了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基础；其后学宋玉等人，则“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怨，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于是只能成为主要以文采著称的二流人物。

鲁迅对文学史的观察是全面的，他既注意叙述文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忽略支流，例如《诗经》中的大小二雅，古代学者多强调其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的一面，近代学者则看重其激切抗争的一面；鲁迅在《纲要》中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论述，他当然更重视那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词”，但在文学史里他并不只论述自己所看重的作品。鲁迅后来说得好：“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带血全都放在丸药内，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删夷枝叶的人，决得不到花果。”（《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片面的考察将无从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

关于汉乐府，鲁迅写道：

武帝有雄才大略……复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十数人作诗颂，用于天地诸祠，是为《十九章》之歌。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实则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也……是时河间献王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大乐官亦肆习之以备数，然不常用，用者皆新声。至敖游宴饮之时，则又有新声变曲。曲亦昉于李延年。

以下还提到《郊祀歌》十九章，并引出了祀南方赤帝之《朱明》一首的全文。这样，几个方面的情形就都讲到了。如果只讲乐府民歌，便容易失之于偏，无从明白乐府的真实情况。将感知的注意力导向一个尽可能广阔的范围，乃是思维技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研究文学史最忌作狭隘片面的观察而必欲得其全，《纲要》在这方面处处都作出了榜样。

鲁迅分析作家也相当全面，例如东方朔，鲁迅既讲他“恢达多端”的一面，又讲他“切言直谏”的一面，并且指出他的思想也相当复杂，刑名、黄老对他都



有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弄臣:“朔盖多所通晓,然先以自衒进身,终以滑稽名世,后之好事者因取奇奇怪语,附著之朔;方士又附会以为神仙,作《神异经》、《十洲记》,托为朔造,其实皆非也”,这与他先前研究小说史论定“见(现存汉人小说皆伪托)相呼应^①,寥寥数语,已足以概括东方朔其人。鲁迅讲司马相如也是如此,既讲他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也分析他的短赋,还提到他的经学和小学,立论相当完备。

鲁迅评论古代文学家每多独到的见解,如关于孔孟,鲁迅并不因为其在思想史上有各自不同的地位而让他们在文学史上有相应不同的地位,因为从文学的立场来看,《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而《孟子》“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后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然更重要些。至于庄子,虽然其思想相当复杂,对后代也有不少消极的影响,而其文学成就在诸子中则应属最高。

鲁迅评论作家作品极其重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异同,深入地予以评论。例如汉初的贾谊和晁错同为著名政论家,“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此其相同者;不同之处则在贾谊文采斐然,但其议论却不免有些书生气,晁错对问题的见解要更深刻些,例如“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过去人们往往更加看重贾谊,特别是他一生坎坷,“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而鲁迅的观察深入一层。评价政论散文,首先须看其政见的深度如何,一味关注文采,则未免轻重失衡。

作家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是否有开拓性的贡献,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特别注意的地方。在汉赋的作家群落中鲁迅特重司马相如,原因即在

^① 现存汉人小说包括署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等,是否出于后人假托,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论定。参见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553~556页;又,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于他“不师故辙，自摭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具体地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盖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由骚体赋一变而为散体大赋，司马相如自有开创新风之功。鲁迅的这一结论现已为文学史界广泛接受。后来鲁迅还从另一角度论述司马相如的特异之处：“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这里又见出鲁迅对于文采亦复十分重视。鲁迅没有片面性。胡适从“白话文学”的角度几乎全盘否定了司马相如，又有许多人因为反对贵族文学、宫廷文学而竭力贬低汉赋；鲁迅不像他们那样偏激。

为了指出作家的特点，有时不仅要在同一文体之内进行比较，还要作跨文体的比较。《纲要》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当推关于司马迁《史记》的论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话就把《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讲得很透彻了。

除分析作家作品以外，鲁迅尤致力于研究和总结规律，从宏观的高度综述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趋势、影响。他往往以寥寥数语讲清了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楚辞，鲁迅有如下简明深刻的概述：“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又如法家与文学的关系、四言诗的源流与影响等问题，也都有简明中肯的概述。还有一些规律的总结，则更超出一般文学史的范畴，而达到更高的层次，如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开头便道：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在封建社会,这确实可算是一条规律。天才往往寂寥孤独,遭遇不佳,中国文学史上这一类事情反复出现,一经鲁迅点破,令人豁然开朗。鲁迅本人的际遇其实也是如此。

鲁迅研究文学史很注意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例如叙述《楚辞》的影响即引用《文心雕龙·辨骚》,分析四言诗的起源则引用任昉《文章缘起》;近人成果列入参考书目者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游国恩《楚辞概论》等等,其著者除胡适算是鲁迅的朋辈、谢无量年辈也比较高之外,其余都是学术界的新秀。此外,参考书目中还列入海外汉学家的论著,如日本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铃木虎雄《支那文学之研究》,指引学生去参考、比较、研究,以养成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厦门,鲁迅还亲自翻译铃木虎雄的一篇论文《运用口语的填词》^①。鲁迅研究古代文学始终有一种面向海内外的开放眼光。

在材料的安排上,鲁迅详近略远,大体依时代先后排列,有大作家时列专篇,如老庄(第三篇)、屈宋(第四篇)、李斯(第五篇)、贾晁(第七篇)以及两司马(第十篇),其余则述其概况,如汉代列有《汉宫之楚声》(第六篇)、《藩国之文术》(第八篇)、《武帝时文术之盛》(第九篇),点面结合,错综成史。以大作家立篇时,往往兼顾有关的次要作家,如《老庄》篇中兼叙儒墨;而在概述全貌时则突出重要作家,如《藩国之文术》篇中重点讲严忌、邹阳、枚乘、刘安。这样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头绪分明,为文学史的编撰体例开创了新的范例。此后不少文学史著作都采用了类似的章法。

^① 译文初载《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27年3月25日),现已收入《鲁迅翻译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172页。



四

离开厦门以后,鲁迅没有再写文学史专著,但曾就文学史问题作过讲演,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广州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外他在杂文和书信中也常常提起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其命意或不过是拿来作为论据或谈资,每有借古讽今的言外之意,而无意于就有关问题作专门的学术研究。但由于鲁迅本来就是学养极深的专家,所以即使是只言片语甚至几句开玩笑的话,也往往大有意味,发人深思,益人神智。鲁迅的文章中又有若干篇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文学史上有关问题的,例如《选本》(作于1933年11月24日,后收入《集外集》)、《杂谈小品文》(作于1935年12月2日,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作于1935年12月18~19日,后亦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本书将这些文章列入附录,以便与《汉文学史纲要》互相参证发明。

后期鲁迅还留下一份文学史提纲和一份学习文学史的参考书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著作》和增田涉《鲁迅印象记·鲁迅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志愿没有完成》,鲁迅拟定的从上古到唐的文学史大纲是这样的六章——

- 第一章 从文字到文章
- 第二章 “思无邪”(《诗经》)
- 第三章 诸子
- 第四章 从《离骚》到《反离骚》
- 第五章 酒、药、女、佛(六朝)
- 第六章 廊庙和山林(唐)

1936年夏天鲁迅对增田涉说,在他活着的时期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全



部文学史,因此想写到唐为止。鲁迅始终没有放弃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他的六章文学史虽然未及写出,但可以由他的讲演、文章、书信、谈话中推知一个大概。

一、从文字到文章 鲁迅对文字学研究有素,除了文学史以外还打算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可惜未及动手^①。1934年鲁迅作《门外文谈》,深入浅出地谈到有关文字的起源和变迁、文学的起源和初民创作中的种种问题,足以补充《汉文学史纲要》的有关部分。该文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二、关于《诗经》 《纲要》已有专章;此后他又指出,“《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其中《颂》多拍马,《国风》则多为无名氏的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但评价也要讲究分寸,即如第一首《关雎》,假如“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里去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在《选本》一文中鲁迅指出《诗经》乃是一部选集,提法与胡适所说的“总集”各明一义,但总的来看更为深刻合理。对《诗经》的成书过程鲁迅作过一些合理的推测,已为文学史界广泛接受。

三、关于诸子 《纲要》中亦有专章,此后鲁迅在文章中多处涉及诸子,思想批判的色彩很浓,例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之评孔子,《〈出关〉的“关”》之评老子,评及庄子的就更多,即如鲁迅晚年论“文人相轻”的一组文章就深入剖析并批判了庄子的相对主义,后来更在新编的故事《起死》中用漫画

^① 1929年初夏鲁迅回北京省亲,颇拟从旧居的藏书里中择取若干书籍,来编这两部书,他在6月1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可是火热的现实斗争更强烈地召唤他投身于战斗,半地下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潜心于学术研究,所以他设想的两部书都无从着手。鲁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写道:“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炸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以致终于未能写出。



式的笔墨勾勒了庄子的形象，讲清了庄子的一个侧面。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过：“杨子为我，只取他自己明白，当然不会著书；墨子兼爱，必使人人共喻，故其文词丁宁反复；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总嫌其太阴柔；庄子的文词深闲放肆，则又入于虚无了。”^①短短几句，说得何等透辟。

四、从《离骚》到《反离骚》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提法，《纲要》中已见端倪，后来鲁迅于1929年12月4日在上海暨南大学以此为题发表讲演，其记录稿（载《暨南校刊》第28~32期合刊）未经鲁迅本人审阅，不知是否十分准确。鲁迅历来反对依傍和摹仿，认为如此便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而扬雄是以摹仿著称的作家，鲁迅对他自然无好感；而且扬雄对屈原也实在隔膜，鲁迅对许寿裳说：“扬雄摭《离骚》而反之，只是文求古奥，使人难懂，所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澜’。但假使竟没有可以回复之处，那将如何呢？《离骚》而至于《反离骚》，《恨赋》而至于《反恨赋》，还有什么意思呢？”^②辞赋作家中有一批人热衷于陈陈相因，正面摹仿之不足，又想办法反仿，实际上无非浪费自己的才华，终归不会有大的作为。鲁迅通过对扬雄的批评，给了一个总的清算。鲁迅在辞赋作家中特别重视司马相如，也正因为他一向不搞摹仿而专事创新，不落俗套，不同凡响。

关于汉代的辞赋和散文，鲁迅在北京时选讲过一次，其选目很有特色，从中颇可推见他的独特见解。

五、六朝 关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文学，鲁迅特别重视，他本人的作品也深受魏晋文章的影响，守己伐人，有度有序。鲁迅著名的学术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虽然包含了若干针对时事的旁敲侧击，但学术内容仍然极其丰富，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给予后人极大的启示和影响。鲁迅在这篇讲演里广泛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社会思潮、民风士风

① 许寿裳《杂谈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0~51页。

② 许寿裳《杂谈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1页。



以及其他许多文化领域的情况,研究有关作家的生活道路、心理状态、性格爱好、思维方式……他把这一切都弄得很透,融会贯通了,然后再来谈作家作品,并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代的文学全貌,自然能居高临下,深入浅出。可惜鲁迅未能再作一次关于南朝文学与女性及佛教之关系的讲演。

以广义的史学为依托研究文学史,从社会风习和文人心理的角度研究文学史,在鲁迅之后继起者颇不乏人,例如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就是一份贡献突出的成果。近年来中古文学以及其他时期的文学研究都在走向深入,鲁迅的榜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关于这一阶段文学史的史料学,鲁迅也有过具体的指点,见于他1929年1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对有关版本的分析,见于《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对于作家专集鲁迅做过专门的整理,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嵇康集》^①和未及搞完的《谢灵运集》^②,此外他还打算整理阮籍的集子,但未及动手;资料方面则辑有《诸家文章记录》和张隐《文士传》^③,此外还有若干比较零星的材料。可惜这些成果至今未能引起文学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对若干魏晋作家已经作了很好的分析,有些看法到他晚年又有新的发展,例如《题未定草》对陶渊明又进行了深入一步的分析;关于嵇康之死,鲁迅晚年也有深刻的分析(详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如此等等。

六、唐代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期,鲁迅对唐诗有过极高的估计,又作过若干具体的分析,例如关于杜甫和钱起,鲁迅就有过大有意味的

^① 参见顾农《关于鲁迅校本〈嵇康集〉手稿》,《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8期。该文现已列入本书附录。

^② 参见顾农《读〈鲁迅辑录古籍手稿〉札记·〈谢灵运集〉等三种》,《上海鲁迅研究》第9辑,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顾农《鲁迅辑本〈众家文章记录〉与〈文士传〉》,《上海鲁迅研究》第12辑,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